



开滦节院

古今谈

辛则民 马实践
武汉测绘科

主编
出版社

编写人员：

辛则民
傅光明
朱朝明
袁莉娟
邹惠艳

马实践
孙秋明
董绪奎
吴国威

“开源节流”

——千古理财工作所遵循的原则(代序)

韩宏树

战国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荀况为理财提出的基本原则是“开源节流”。他强调理财“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荀子·富国篇》)。“开源节流”的原则，自经荀况提出，就成为千古理财工作的一个不容争议的原则。

荀况所说的“开源”，不仅包括开财政收入之源，更主要的是指广开社会财富之源。他所说的“节流”，虽然也是指节约财政开支，但其提倡节流的含义也不止限于财政领域，而以节流作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广开社会财富之源的手段。而后代的理财家讲的“开源”，一般都是局限于财政领域本身，以各种手段增辟财政收之源如开征新税、整理旧税以增加收入、举办财政专卖事业以及出售国家财产等。后代所讲的“节流”，也只是从财政领域本身考虑的，是要通过节约财政开支来消除或减少财政赤字。

荀况“开源节流”原则的思想理论基础，是他对经济和财政的相互关系的认识。

荀况强调经济与财政之间是本与末、源与流的关系。社会经济，尤其是农业，是社会财富的本与源，而财政则是社会财富的末与流。他指出“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垣窞仓库者，财之末也；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货之源也，等赋府库者货之流也”。(《荀子·富国篇》)可见他明确指明了社会生产是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只有社会生产发展了，社会财富才会增加，才能“漠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国库才有了可靠的财富来源。在此，荀况明确了社会经济与财政的主次关系，指出社会经济决定财政。

明确了经济与财政的关系后,荀况又指出增加财政收入的唯一办法是发展经济,不能单纯依赖增加税收的手段来充实国库,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培养税源,以增加财政加入。他所说的“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就是这个意思。

荀况虽然强调经济是财政的本和源,但并不把财政看作是消极的,而认为财政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会有重要的影响和反作用,可以促进或妨碍社会经济的发展。他提出了“以政裕民”的主张,并把它看作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实现强国富民的有力手段。明确地提出“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夫是之谓以政裕民”。荀况此处所言之“政”是指国家的各项政策,而不限于财政、赋税政策,但财政、赋税政策无疑在其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基于这种认识,荀况一方面主张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广开社会财富之源;另一方面主张财政开源节流,以保证国家各项政策的实施。

荀况的“开源节流”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在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一些有所作为的封建帝王讲求“开源节流”的原则,促进了社会生产发展。如汉光武帝刘秀,采取开源节流的政策,释放奴婢,减免赋役,恤贫救灾,兴修水利,垦辟土地,修边安民,军士屯田;裁并郡国,省减吏员,使社会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清代康熙皇帝对管理财政实行开源与节流相辅相成,开源为主,但节流亦不可忽视。特别是他运用财税政策于康熙 51 年宣布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之制,促进了生产和财政收入的增长。他提出“尚节俭以惜财用”的方针,节省了财政开支。

我们党一贯重视和实施“开源节流”的政策。毛泽东同志早在 1934 年的《我们的经济政策》中提出:“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是我们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120 页),1942 年 12 月他提出:“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财政充裕的”。周恩来同志在 1949 年 12 月《当前财经

形势和新中国经济的几种关系》中提出，全国财经计划的根据其中第三点是“开源节流”。我们开源主要是依靠人民：一是来自农村的负担；二是来自城市的负担；三是国家企业的收入；四是预支，即借债。开支方面安排是节约的。（《周恩来选集》下第6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获得了新的解放。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加快经济改革步伐的目标和任务，并提出下决心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切实做到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国务院已向八届人大一次会议提出了机构改革的方案并经会议原则批准，这实际上是“开源节流”，有利于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缓解财政困难。在财政工作中仍应坚持“开源节流”的方针，大力支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促进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积极培养和开辟财源，加强收入征管，增加财政收入；在支出上要从严控制。按照李鹏总理1991年7月在全国财税工作会议上所提的要求：“要狠抓开源节流，增收开支，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筹集更多的资金”。

省财政厅的几位同志，搜集了历史上上百位理财家“开源节流”的理财事迹，这对于做好我们当前的财经工作很有指导意义。“以古为鉴，可知兴替”，学习古人“开源节流”的措施和办法，有利于开拓我们的理财思路，启迪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做好财政工作。

应作者之邀，写了以上这些话，以为序。

目 录

序	(1)
1、孔子 轻徭薄赋节用爱人	(1)
2、孟子 不言恒产	(3)
3、荀子 开源节流	(8)
4、墨子 生财节用	(9)
5、庄子 重生产崇节俭	(12)
6、范蠡 治国经商	(13)
7、老子 寡欲崇俭反对苛敛	(14)
8、李悝 尽地力善平籴	(17)
9、白圭 人弃我取人取我予	(18)
10、《大学》 德本财末 生众食寡	(20)
11、杨朱 适欲消费 奉身不取	(22)
12、子产 作封疆作丘赋	(23)
13、晏婴 躬行节俭薄身厚民	(24)
14、子贡 善贾	(26)
15、赵奢 依法治税	(27)
16、管仲 富民相齐	(28)
17、商鞅 开阡陌赋税平	(35)
18、秦始皇 建立集权财政	(38)
19、刘邦 轻徭薄赋休养生息	(40)
20、汉文帝 重农贵粟薄赋崇俭	(44)
21、汉武帝 盐铁及酒专卖均输平准推行缗赋	(47)
22、萧何 抚百姓给饷餉	(51)
23、桑弘羊 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53)
24、晁错 薄赋广积劝蓄集权	(56)
25、贾谊 富安天下	(58)

26、耿寿昌	改革漕运实行常平仓制度	(61)
27、王莽	五均六管	(63)
28、汉光武帝	休养生息 精兵简政	(66)
29、孙权	重农兴工	(70)
30、曹操	屯田租调立制	(72)
31、诸葛亮	理财治本 富国强兵	(75)
32、司马炎	发展农业实行占田课税	(76)
33、刘裕	推行土断法减役崇俭	(79)
34、付玄	减役轻赋至平积俭有常	(81)
35、萧道成	检籍倡俭	(82)
36、石勒	发展生产均平赋税	(84)
37、孝文帝	创立均田制 改订租调制	(86)
38、宇文泰	恢复均田租调制	(92)
39、李渊	宽简立制	(93)
40、唐太宗	以农为本 去奢省费	(98)
41、武则天	劝农桑 薄赋税	(101)
42、唐玄宗	括户查田减轻负担	(105)
43、魏征	抚民以静	(108)
44、陆贽	重开源 量入为出	(111)
45、宇文融	检田括户	(113)
46、杨炎	两税法量出制入	(115)
47、刘晏	改革漕运刷新盐政	(117)
48、杜佑	食货为先	(119)
49、茶税	兴财	(121)
50、郭威	轻负废苛	(122)
51、柴荣	均赋去奢	(125)
52、宋太祖	集权统一	(127)
53、宋仁宗	带头节俭	(129)
54、赵普	集权废苛	(131)

55、吕蒙正	轻赋薄敛 强兵省财	(134)
56、司马光	养本取余 杜绝奢华	(136)
57、李泌	宽敛裁员	(139)
58、马殷	利用资源富国	(141)
59、李便	富民开源	(143)
60、王安石	改革兴财	(144)
61、叶适	量出制入消除苛捐	(153)
62、薛田	倡行官交子	(156)
63、沈括	操货币之财	(158)
64、范祥	推行钞盐法	(161)
65、包拯	廉正理财	(163)
66、宋祁	去三冗三费	(165)
67、二程	力减民赋 沉汰择精	(168)
68、朱熹	正义不谋利	(171)
69、郭谠	方田法	(172)
70、李椿年	经界法	(173)
71、赵尚宽	勤农政	(174)
72、李迥	治漕运	(175)
73、赵开	茶马法	(177)
74、叶李	制订《宝钞画行条例》	(180)
75、耶律楚材	确立税制	(181)
76、阿合马	兴商利	(184)
77、朱元璋	屯田定制	(186)
78、海瑞	兴国八议	(188)
79、夏原吉	不继国用	(193)
80、葛守礼	均赋稽核	(195)
81、靳学颜	轮番守戍 银钱并行	(196)
82、张居正	一条鞭法	(198)
83、周忱	平米法济农仓	(201)

84、况钟 均赋废苛	(203)
85、潘季驯左光斗 兴水兴财	(204)
86、郑成功 台湾屯田促产	(205)
87、李自成 均田免粮	(207)
88、王船山 民本轻赋	(210)
89、清太宗 重农编户均平财政	(213)
90、康熙 促产崇俭	(215)
91、雍正 摊丁入亩耗资归公	(217)
92、乾隆 重农务本蠲免促产	(220)
93、多尔袞 圈地蠲免三饷	(223)
94、鄂尔泰 改土归流	(226)
95、陶澍 三治理财	(227)
96、林则徐 改漕禁烟	(230)
97、洪秀全 均产废苛	(232)
98、王茂荫 钞法折	(234)
99、康有为 理财救国	(236)
100、左宗棠 五整一办	(239)
后记	(244)

孔子 轻徭薄赋节用爱人

孔子名丘，字仲尼，姓孔氏，鲁国曲阜人，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前551年），死于周敬王四十一年（前479年），他是春秋后期最有代表性，影响也最为深远的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是代表封建领主利益的政治思想家，他的基本思想是仁，其在政治方面，主张行仁政。因而他的财政思想，也是从仁的中心思想出发的，主要的便是“不放纵自己去侵犯众人，更进宁是牺牲自己以增进众人的幸福”。（《论语·述而》）

一、轻徭薄赋思想。孔子是先秦思想家中首先提倡轻徭薄赋的人，他把轻徭薄赋作为一项基本的财政原则而言之谆谆，并对轻徭薄赋的内容、方式和意义都作了一定论述。这使他在轻徭薄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中所起的作用，都远非前人或同时人所能及。

孔子的轻徭薄赋思想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反对贪冒，反对聚敛，如“季氏富于周公，而求（冉有）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他谴责地主阶级的赋税改革是“聚敛”和“贪冒无厌”。为此他提出了“敛从其薄”（《左传》鲁哀公十一年）的主张。二是借主张轻徭薄赋来反对当时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的财经改革，要求恢复同代的旧例，读一读孔子的学生有若同鲁哀公的一段对话是饶有兴趣的，“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可见，有若明确要求减税，并指出重税会削弱课税的基础，缩减税收的来源。有若提出的轻税标准还是十分取一的。他的轻税主张的具体内容是恢复彻法，维护礼制。

更能体现孔子这一思想的，是他作《春秋》，对于履亩税，便讥

为“初税亩”，在这三字中，孔子的寓意如下：

“初税亩。初者何？始也。税亩者何？履亩而税也。初税亩何以书？讥。何讥尔？讥始履亩而税也，何讥乎始履亩而税？古者什一而籍，古者曷为什一而籍，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颂声作矣。”（《公羊传》宣公十五年）可见，孔子所肯定的税法是彻法，所肯的税率也是十分之一。

轻徭薄赋的思想自孔子宣传，在此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就成为一个不容争辩的原则，成为理财方面的千古“圣训”，成为“仁政”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内容。

二、节用爱人的思想。他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他还以为个人生活也俭胜于奢，因为“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宁固。”（《论语·述而》）这便是说，办财政首先要节约民财与民力。其次，不论个人生活与国家财政，均以节约为指归。第三，他不赞成上层统治者十分奢侈的行为。在某些场合，他也指名批评过个别统治者。如说：“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论语·泰伯》）他称赞禹“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论语·季氏》）这也有向上层统治者宣传俭德，甚至有对他们的穷极淫侈的行为进行批评的意味。

三、富民的思想。孔子及其弟子，不仅明确提出了富民、足民的主张，把这看作是治国，为政的基本纲领之一，并且开始把富民和富国、富家联系起来。“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较为正确地指出富国同富民、国民经济同国家财政的关系，体现了藏于民的思想。而“国民之所利而得之”，则已在一定的程度上把富民和富家联系起来。在孔子的财政经济思想体系中，富民已成为一个含义比较明确、内容比较丰富，并有了一定的说明和论证的思想。如“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季氏》）孔子也是重视经济与武备的。但经济与武备是立于信的基础上的。可见，足食足兵为立国之本。其基础还是民富。

但是如何富民呢？孔子认为主要是用惠而不费的办法，那便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论语·公冶长》）他还认为富民不能用不正当的方法：“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显仁》）

总之，孔子的财政思想主要是轻徭薄赋，节用爱民，达到足食足兵和富民的目的。

孟子 不言利恒产

孟子名轲，（公元前 372 年—前 289 年），字子舆，一字子东。邹国（今山东邹县）人。孟子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他的先世是鲁国公族孟孙氏。西汉韩婴的《韩诗外传》和刘向的《列女传》均载有孟母“三迁”和“断织”的故事，说明在孟子少年时代其家庭已经失去了贵族地位。但他却受到了传统的贵族子弟所必要的严格家庭教育。孟子早年受业于思之门人（《史记·孟荀列传》）。子思是孔丘的孙子，曾参的学生，儒家学派的一个重要人物。这使他能够系统地接受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派的思想理论。孟子曾带着车子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孟子·滕文公下》）游说齐魏等国。曾得到许多诸侯国君的尊敬，在齐国并一度住于三卿之中，但由于孟子的思想主张同当时各诸侯国富国强兵的要求格格不入，被认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荀列传》）而未能得到推行。到了晚年，孟子便不再出游，而和其门徒一起整理自己的学说：“序诗书，述仲弓之意，作《孟子》七篇。”（《同上》），他对孔子的学说有进一步的阐发，对儒家学派的创建和完成，有极大的贡献。孔孟之道成为儒学的正统。

一、孟子“何必曰利”的基本思想。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义主利从的思想，并有了重要的发展，孔子“罕言利”，孟子则更加偏激，提出了一个绝对反对言利的“何必曰利”的观点：“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业，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

“……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孟子·告子下》）

在孟子看来，君臣上下以利相接就会亡国，专言利以及物质利益，到作用和危害性极大，必须兼言思想教育。

其实，孟子说“何必曰利”，只是反对“上下交征利”，不是主张不“曰利”，相反的，他很重视财利问题。他言利的一个前提，即各等级、各社会集团要互相承认彼此之间在财利问题上的界限。首先，“小人”即平民必须承认和尊重，“君主”即君主、贵族、封君等官僚等地主阶级上层人物的特权和既得利益，并且要提供足够的剩余劳动和剩余劳动产品来“养君子”；同时，“君子”也要承认“小人”特别是小人中的“野人”即农民和生存权利，使他们能有一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时间来生产自己一家人所需的必要生活资料，不可以过重的剥削，奴役破坏他们的生产和基本生活条件。他把“上下交征利”斥为霸道，而把自己所设想的这种上下交互承认财利界限的办法看作是“王道”的要求。

孟子发挥了孔子的学说，特别发挥了孔子的仁义部分的学说。仁是内在，义是表现，二者为一物之两面。孟子进一步又分析为四项，即仁义礼智，仁为侧隐之心，义为羞恶之心，礼为恭敬之心，智为是非之心，这些美德，均为人所固有，非为外铄，因而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孟子·告子上》）

把仁义说应用到治国，其具体是什么呢？孟子一再假托周文王的“治绩说：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稽）

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孟子·梁惠王下》）“耕者九一”是孟子所宣扬的“最合理的赋役标准，这是对农民经济利益的承认；“仕者”有世袭的职位的俸禄，这是对地主阶级上层的既得利益的承认；“关市讥而不征”，是对商贾的经济利益的承认；“泽梁无禁”是对虞、衡等采伐渔猎生产者经济利益的承认。孟子所列举的“仁政”的五项基本内容有四项是关于财及经济方面的政纲，也是处理人们献身得或经济关系的纲领。只要讲仁政、行仁政，人们的财利或经济关系，就自然可以得到“合理的”处理，所以，就用不着在仁、义之外再讲利了。……这正是孟子“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的论点的真实含义。

二、继承发展“轻徭薄赋”的思想，孟子的“轻徭薄赋”思想，是对孔子的“敛从其薄”，“使民以时”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更多的是从“富民”、从保护农民的再生产和生存条件来论证轻徭薄赋的意义。如说，“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孟子·尽心上》）“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孟子·尽心上》）“百亩之田，无夺其食，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滕田文公上》）

（一）使人民有“恒产”是“仁政”的基础和轻徭薄赋的重要内容。孟子说：“无恒产而无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梁惠王上》）“恒产”意指恒产的财产，即为百姓国家地占有或使用的财产。这种恒产必须使劳动者能够利用它生产出可以维持劳动者一家的生存所需的基本生活资料，做到“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无死亡。”（《孟子·梁惠王上》）说得更准确一些，恒产就是百姓私人所有或归私人恒久使用的足以维持本人及家庭成员生存，足以维持劳动者再生产的财产。

恒产要足以维持每一农户的生存，它必须有一定的数量。孟子为恒产所规定的数量标准是五亩之宅，百亩之田。他说：“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生其时，老者足以无生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

饥矣。”(《孟子·尽心上》)“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可见，孟子所谓恒产，具体地说是维持一个八口之家(包括一个男丁和他的父、母、妻以及四个子女)的农户的生活所需要的耕地、住宅，以及其他农副业生产资料，包括百亩(约合今亩31.2亩)之田，五亩之宅，若干株桑树(供养蚕织帛)以及五母鸡、二母猪。孟子认为，每个农户有了这样的恒产，就可以保证“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了。”

恒产的主要内容是耕地，使每一个农户能有百亩之田，为此，就必须划清各户耕地的疆界，即“正经界”。孟子设计过一个“制其田里”的具体实施方案。即实行井田制，然后在井田制的基础上实行助的财政收入法。这样初期封建社会可分为领主和佃农两部分人。前者为劳心者，后者为劳力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滕文公上》)既做了君子，便以治人为业，不必再行劳动，其生活所需，便得通过助税法而受到小人的供养；虽则是受其供养，但取之以屏，用之以节，这才合乎节用爱民的要求，才能缓和两个阶级的对立与矛盾。

(二)将“轻徭薄赋”具体化和制度化。他提出“取之于民有制”。(《孟子·滕文公上》)所谓“取之民有制”，就是主张国家的赋税、徭役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制度规定，不能听任统治者任意诛求，以致侵蚀百姓的恒产和他们赖以生存的必要劳动部分。(1)征收标准：应该是对劳动产品十分取一为赋税，并按不违农时的原则征发徭役。以供应百官有司的俸禄，保证城郭宫室建造以及宗庙祭祀，外交活动的需要。(2)主张只能用助法而筹得国用，而不对其他行业征税。他说：“耕者，助而不征，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孟子·公孙丑上》)助法是农业税，是徭役地租性质，只有这种税是孟子所承认的，其他的税，便不为孟子所许可。他主张“去关市之征”

《孟子·滕文公下》“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廛无夫里之布”（不征房屋税和人头税）《孟子·尽心下》他主张只对少数垄断市得的商人，征点税。不过这种征商实际是一种惩罚，它和“养君子”、“实府库”而征收的赋税性质不同。（3）在纳税方式方面，他主张尽量单一化，避免以多种方式同时征收。在当时自然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以货币征税的情况还是很少的，主要的征税方式是以实物和力役征收，正如孟子说的“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孟子·尽心下》在布帛之征、粟米之征和力役之征三者之中，他主张“用其一，缓其三”，并认为“用其二而民有菜，用其三则父子离。”《孟子·尽心下》二者之中只应用其一，用那种为好呢？他主张“助而不税”，即只实行力役之征，他说夏代的税制“贡法”是实物税，而商代的税制“助法”是力役之征，并引用一个“古贤人”龙子的言论说：“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久；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孟子·滕文公上》其实助法较贡法，是一种人身依附性更强的形式，“公更毕然后敢给私事”，而贡与助法相比，可以有较高的劳动积极性和较高的劳动生产率的。这是孟子的思想局限性。

三、节省开支、厉行节约、禁止浪费的思想。孟子认为君主们节省开支非常必要，因为其浪费，可以招致老百姓的饥饿，他说“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孟子·梁惠五上》他对君主大人們的铺张浪费的现象予以抨击：“该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孟子·尽心下》他反对战争，主张压缩军费“予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孟子·离娄上》他批评君子大兴土木而独乐的行为，认为会民怨沸腾。“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汝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

兽，岂能独乐哉？”（《孟子·梁惠王上》）

荀子 开源节流

荀子，名况，字卿，赵国人。其早年游学齐国稷下学宫，中年的大部分时间在稷下学宫任教。其一生，主要是从事教学和著作。他培养的著名弟子有韩非和李斯。他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其财政思想有其独到之处：

一、“下富则上富”，“以政裕民”。他认为，富民、富国是相辅相成、相互依赖的，富民的过程也是富国兴邦的过程，即所谓“下富则上富”。（《富国》）荀子作了详细的解释：“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有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上以法取焉，则下以礼节用之。余若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藏之。夫君子何患乎无余。”（《富国》）为了达到“下富则上富”的目的，他主张动员和组织广大劳动者辛勤劳动。他说：“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夫是之谓以政裕民。”（《富国》）

二、大力发展农业和工商业生产。他主张“养其和，节其流，开源其源，而时斟酌焉”。（《荀子集解·富国》）他说：田野县鄙是“财之本”，垣窖仓廩是“财之末”；农民适时耕种，夺取农业丰收是“货之源”，按等征收税赋以充实府库是“货之流”。荀子把农业生产看作衣食之源，看成追利求富的根本来源。他认为，要发展农业生产，要抓住这个根本。他强调“无夺农时”。在论述“强本”时，他认为“农夫不斂削，则器用巧便，而财不匮矣。”（《王霸》）即发展工商业。特别是商业“天之所复，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上以饰贤良，下以养百姓而安乐之。”（《王制》）

三、节用与裕民并重。荀子认为单纯“节用”不能使财政富起